

911
中國畫家叢書

戴逵

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中国画家丛书

戴逵

洪惠镇 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戴 逸

洪惠镇 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)

责任编辑: 邓 明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树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.375 附图 3 幅 字数 25,000

1988年6月第1版

印数 2,300

目 次

一、 戴逵的生平·····	(1)
二、 戴逵的艺术成就·····	(12)
(一)绘画·····	(13)
(二)雕塑·····	(18)
三、 戴逵二子勃与颙·····	(24)
四、 戴逵的贡献与影响·····	(28)

一、 戴逵的生平

从公元三世纪初到公元六世纪末的魏晋南北朝，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复杂而动荡的时代。但在美术史上，它却人才辈出，群星璀璨。单是东晋(317—420)就出了三位划时代的美术家：“书既为古今之冠冕，丹青亦妙”^①的王羲之；“画有苍生来所无”^②的顾恺之；“荀卫之后，实为领袖”^③的画家兼雕塑家戴逵。这三位美术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，王羲之约比戴逵大五、六岁，顾恺之比他们小二十几岁，是后起之秀。

可惜，那个时代毕竟太遥远了，一千六百多年前的这些大师们，在历史长河中所留下的轨迹，大多模糊乃至消失了。我们今天单凭幸存下来的有限史料和作品来瞻仰他们，有如单凭肉眼眺望群星一般，看不太清他们的面目。王羲之、顾恺之的史料与作品相对来说，还比较丰富。戴逵是位隐士，从不参与政治和一般的社会活动。《晋书》本传除一篇他“以放达为非道”的论文外，有关他生平事迹的记载总共不上六百字。其中还包括两篇当时朝臣向皇帝建议征聘他和取消征聘的疏文，剩下的材料就如凤毛麟角了。此外有关他的生平与创作活动的材料，散见于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、檀道鸾《续晋阳秋》、《宋书》戴颙传

①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。王羲之生卒年有两种说法，下文取(321—379)一种。

②刘义庆《世说新语》谢安语。《历代名画记》引作：“卿画自生人以来未有也。”又云“卿画仓颉古来未有也。”

③谢赫《古画品录》。

《晋书》谢玄传、谢赫《古画品录》、裴孝源《贞观公私画史》、李嗣真《续画品录》、张彦远《历代名画记》、米芾《画史》、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、《嘉兴府志》、《绍兴府志》、道宣《法苑珠林》等书。这些书上的材料有的只有一鳞半爪，有的互相重复、有的还有舛误，实际上能提供我们研究的相当有限。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，因此本书只能根据这些有限的材料，对戴逵的生平以及艺术创作勾画个大体轮廓。更深入完备的研究和介绍。还有待于博识之士及将来文物考古的新发现。

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太元二十年(395)、太傅会稽王司马道子等人上疏说戴逵“执操贞厉，含味独游，年在耆老，清风弥劭”“宜加旌命，以参僚侍”，要求“所在备礼发遣”。可是“会病卒”，就是适逢他病逝了。^①戴逵逝世的这一年，“年在耆老”，耆为六十，老为七十，即年近七十岁。若以七十岁计算，他的生年当约在公元三二五年，即晋明帝司马绍太宁三年。在临终这次征聘之前，《晋书》本传还记载：“孝武帝时，以散骑常侍、国子博士累征”。《晋书》孝武帝本纪纪明太元十二年六月“束帛聘处士戴逵、龚玄之”。戴逵以父亲生病为由推掉了。地方当局不断敦逼他，他只好逃到苏州。会稽内史谢玄担心戴逵逃远了不回来，上疏为他说情，说是“戴逵希心俗表，不要世务，栖迟衡门，与琴书为友，虽策命屡加，幽操不回，超然绝迹，自求其志。且

^①见《晋书》卷九四戴逵传。《历代名画记》记为太元二十一年(396)，许多现代美术史论书籍亦以这一年为戴逵卒年。按《宋书》卷九十三戴颙传载，颙十六岁遭父忧，他本人卒于元嘉十八年(441)，享年六十四岁。十六岁时三九三年。如果六十四岁是虚龄，实足年龄按我国传统算法扣两岁的话，十六岁时正好是三九五年，故戴逵卒年当以这年为是。

年垂耳顺，常抱羸疾，时或失适，转至委笃”“宜使其身名并存，请绝其召命”。①孝武帝于是作罢。“累征”“策命屡加”，是征聘不止一次。太元十二年的一次，郑重其事载入孝武帝本纪，可能是第一次，那时戴逵已年近六十岁（耳顺）。太元十二年为公元三八七年，那末他的生年又应是公元三二七年了。同一篇传里，关于年龄的记载就有两年之差。我们只好折衷一下，将戴逵的生年定在约三二六年（太宁四年）。

我们先推算出戴逵的大体生卒年代以后，再研究他的生平就有点根据了。

戴逵，字安道，谯国铚县（今安徽宿县）人。祖戴硕、父戴绥都有过名位。②《世说新语》识鉴篇说他“十余岁在瓦官寺画，王长史③见之曰：此童非唯能画，亦终当致名，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。”看来戴逵青少年时代曾在建康（今南京）一带生活和创作过。从这一点推测，谯国可能是他的祖籍，父祖因有名位而侨居建康，戴逵便有可能在建康度过他的青少年时代。至于他那时作画是经人指授还是无师自通，就不得而知了。后来他到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拜学者范宣为师，则是学习儒业。④

①《晋书》卷九四戴逵传。

②《世说新语》栖逸篇注引《戴氏谱》。

③王长史，名濛，字仲祖，善隶书，丹青甚妙。简文帝辅政时贵幸之，为司徒长史，二十九岁卒。还有另一个王长史，名廋，字伯舆，生活在东晋后期，此处王长史是王濛。

④《历代名画记》卷二论传授南北时代，说戴逵学画“师于范宣”，并注云“荀、卫之后，范宣第一”。卷五记叙戴逵时又说：“逵尝就范宣学，范见逵画以为亡用之事，不宜虚劳心思；逵乃与宣画《南都赋》，范观毕嗟叹，甚以为有益，乃亦学画。”如此说来，范宣原并不谙画事，如何作戴逵之师？前后矛盾，或为彦远笔误。

范宣字宣子，陈留（今河南开封东南）人。《晋书》有传，称他“少尚隐遁，加以好学，手不释卷，以夜继日，遂博综众书”“家至贫俭，躬耕供养”。也是屡有征召“并不就”，甚至不愿接受地方官救济的隐士。他“虽闲居屡空，常以讲诵为业，谯国戴逵等皆闻风宗仰，自远而至”。《世说新语》注引《中兴书》说：“逵不远千里往豫章诣范宣。宣见逵异之，以兄女妻焉。”别的学生都没提到名字，只有一个戴逵，还结为姻亲，无疑他是范宣最得意的门生。他一生坚持隐遁和儒业，恐怕都是受了老师影响。

戴逵生了两个儿子，长子勃，次子颙。颙生于公元三七七年，^①那时戴逵已经是五十一岁的老人了。勃生平不载，若以兄弟年龄相差较大限度十五岁计算，戴逵生勃时当不会早于三十五岁。如此看来，他结婚较迟，也说明他去诣范宣时，恐怕已过了而立之年。

戴逵结婚后又回到建康生活，并可能同他的父母兄弟住在一起。宋代葛立方《韵语阳秋》引《京师寺记》说，兴宁二年（364）释慧力建瓦官寺，戴逵曾在该寺画文殊菩萨像。顾恺之画维摩诘像。那时戴逵年约三十八岁，已是结婚之后。《晋书》本传说有一次太宰司马晞“闻其善鼓琴，使人召之。逵对使者破琴曰：‘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’。晞怒。乃更引其兄述，述闻命欣然，拥琴而往”。可见戴逵和家人不同居一宅也是同住一邑的。司马晞是在穆帝司马聃即位时（345）迁太宰的，那时戴逵年仅十九岁左右。戴逵传记载此事在娶范宣兄女之后，司马晞当不是在戴逵青年时代召他弹琴的。司马晞在简文帝司马昱即位（371）时被桓温上表免除太宰职务，这时戴逵约四十五岁，已移居剡县四、

^①《宋书》卷九三戴颙传记颙卒于元嘉十八年（441），享年六十四岁，生年即应是太元二年（377）。

五年，召他弹琴应在此之前，也就是他画瓦官寺壁画前后。戴逵除有哥哥戴述外，还有位弟弟戴逵，以武勇显，跟随谢玄征战有功，封广信侯，位至大司农。①

戴逵后来徙居会稽剡县（今浙江新昌），具体何时没有记载。徙居剡县可能和当时两位名流有关，一是僧侣支遁、一是官僚郗超。

戴逵游心释教，和支遁颇有来往。支遁（314——366）字道林，是东晋僧侣中开清谈风气的代表人物。他的中晚年均住在剡县石城山栖光寺。晋哀帝司马丕即位（362）时，曾经请他去建康东安寺住了近三年，后来请归，不久在本山去世。②《世说新语》伤逝篇说“戴公（即戴逵）见林法师（即支道林）墓，曰：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，冀神理绵绵，不与气运俱尽耳。”看得出他对支遁相当崇敬。支遁在京那几年，正好相当于戴逵婚后在建康生活的时期，两人的交游无疑是在这个时候。

郗超③也是个佛教信徒，和支遁相互敬重。《晋书》本传说他有个特点：“性好闻人栖遁，有能辞荣拂衣者，为之起屋宇，作器服，畜仆竖，费百金而不吝。”戴逵隐居剡县的房子，就是郗超措建的，“甚精整”，在戴逵眼里简直象“官舍”一样考究。④由此可以推测，大概戴逵因仰慕和追随支遁，自己选择并经郗超帮办才迁居剡县。时间应在支遁回山的同时或稍后，即约三六五至三六六年之间，那时戴逵四十岁。按郗超为隐居者捐助的标准

①《晋书》卷七九谢玄传。《世说新语》伤逝篇作戴逵之兄，注引戴氏谱逵作逵，封广陵侯。金维诺《中国美术史论集》以戴逵为戴述，不知何据。

②《中国佛教》卷二。

③郗超，字景兴，高平金乡（今山东巨野一带）人，官司徒左长史。

④《世说新语》伤逝篇。

来看，戴逵的栖遁生活是够舒适的。后来，大约他父亲致仕后也来住在一起，所以他以父病为由拒绝征召。

戴逵徙居剡县后，有时仍去建康活动。《世说新语》雅量篇说“戴公从东出，谢太傅往看之”，同他谈论琴书。谢安生于公元三二〇年，约长逵五、六岁。他“始有仕进志，时年已四十余”。^①戴逵和他的相见、当在四十岁到六十来岁之间。谢安死于三八五年，那时戴逵年约五十九岁。“戴公从东出”，从方位看，无疑是由今浙江新昌向江苏南京而言的。可见那时戴逵已徙居剡县，并时到建康探亲访旧（他的父母兄弟还在建康），同时从事美术创作活动。

谢安死后两年，即孝武帝太元十二年，戴逵因躲避征聘，不得已偷偷逃到苏州，住在吴国内史王珣的武丘山别馆，和他游处积旬。谢玄上疏请绝召命，他又返回剡县，出走时间并不长。但那时他的健康状况已不太好，“常抱羸疾”，过了八年，便在太元二十年病逝。

东晋从公元三一七年建国至四二〇年灭亡，共一百零三年。戴逵的一生，恰好经历了这个王朝的主要时代。他“性不乐当世”“累征不起”，甘心终老林泉，是有原因的。

西晋灭亡以后，中国北方人民呻吟在少数民族首领们的混战之中。司马氏皇室南渡建立东晋政权，偏安江南一隅，无心北伐统一国土。随皇室南下的中原士族，目光也只专注于权利的重新分配。因此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一直存在互相倾轧、争权夺利的尖锐矛盾，政权始终动荡不安，少有宁日。以公元三二三年至三二四年，也就是戴逵出生前几年，爆发过朝廷与王敦

① 《晋书》卷九八谢安传。

之间的两次战争。三二七年，戴逵出世一年后，又爆发了朝廷对苏峻的平叛战争。以后，东晋朝廷又面临桓温的威胁。桓温于三七一年废海西公司马奕，立简文帝司马昱，同时废徙诛杀了许多大臣，专擅朝政，窥视神器。皇帝废立时，戴逵年约四十五岁，已徙居剡县多年。在此之前，他在京都建康，必定亲眼看到桓温的声威与跋扈。他之避居剡县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想必不无关系。

桓温死后，谢安执政，大族势力暂时平衡，东晋政权内部稍显团结，在三八三年取得了抗拒前秦苻坚南侵的淝水战役大胜利，还趁势北伐收复了部分中原失地。但不久这个局面又受到破坏。谢安所辅佐的孝武帝司马曜，是一个昏庸无能的酒徒，“殆为长夜之饮”，^①少有醒日。被他重用的同母弟司马道子独揽朝政，树立朋党，排斥谢安。谢安不得不避居外镇，不久患疾，于太元十年(385)逝世，时隔淝水战役胜利仅两年。谢安死后，孝武帝才派人束帛征聘戴逵。逵与谢安有一定交往，谢安的遭遇对他不能没有触动，当然是累征不出的。他曾经画过一幅画，表现临深履薄的人们战战兢兢的神态，也许可以用来理解他拒绝征召的缘故。

孝武帝在位二十二年间，“太白连年昼见，地震水旱为变者相属”。^②这种种自然灾害，在古代往往被视作上天惩罚无道的征象。连孝武帝也害怕了，曾经下诏宣布“上天垂监、谴告屡彰”而大赦天下。在黑暗腐败的政治统制与频繁暴虐的自然灾害中，人民遭受到怎样的苦难是不难想知的。司马道子当政，官以贿迁，政刑谬乱，挥霍无度，民不堪命。有人作《云中诗》谴责庸庸者显赫，高才者沉沦，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的社会现象，其

①② 均见《晋书》卷九孝武帝本纪。

中提到“东山安道(即戴逵),执操高抗,何不征之,以为朝匠”。^①说明戴逵在当时名重天下。孝武帝之征聘戴逵,很可能迫于社会舆论。他下诏征戴逵与龚玄之,说他们“并高尚其操、依其游艺,洁己贞鲜”,^②总算想到靠正派人来帮助维持统治。可是那也只是杯水车薪,于日末途穷的皇朝能有什么用处?戴逵和龚玄之都拒绝了。谢安死后,朝政尽归司马道子及其子元显,于是又出现孝武帝与司马道子父子之间,以及道子父子之间的权力斗争,政治更加黑暗混乱。太元二十年由道子带头再次建议征召戴逵,戴逵即便不病死,也绝不会同意和这个祸国殃民的大奸为伍。孝武帝在戴逵病逝后的第二年去世,东晋就面临崩溃的边缘了,再经过二十几年混乱,终于彻底灭亡。

戴逵不乐当世,除社会与政治上的原因外,还有哲学上的原因。从汉末到魏晋,在篡权夺位的政治旋涡中求生的士大夫,哲学思想发生激变,儒学失去统治地位,老庄周易主宰了思想界。魏正始时王弼、何晏首倡玄学,嵇康、阮籍等继之扩大影响,清淡之风于是大盛,甚至一直贯串了整个魏晋南北朝。清淡家“口谈浮虚,不遵礼法,尸禄耽宠,仕不事事”“立言藉于虚无,谓之玄妙;处官不亲所司,谓之雅远;奉身散其廉操,谓之旷达”“其甚者至于裸裎言笑”。^③人生观蒙上悲观消极的灰尘,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无人关心,政治与社会风气遭到腐蚀。不少人因而谴责这种时尚。卞壶曾因当时的贵族子弟羡慕王澄、谢鲲等人的放荡,严厉地指出:“中朝倾复,实由于此。”^④桓温也

① 《晋书》卷六四简文之子道子传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九四龚玄之传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三五裴頠传。

④ 《晋书》卷七〇卞壶传。

说：“遂使神州陆沉，百年丘墟、王夷甫(王衍字，大清淡家)诸人不得不任其责！”^①戴逵的老师范宣也叹息：“正始以来，世尚老庄，逮晋之初，竟以裸裎为高。”^②

戴逵在这方面是受老师影响的。《世说新语》说他师事范宣时，“视范所为，范读书亦读书，范抄书亦抄书”。可说是亦步亦趋了。因此戴逵也“常以礼度自处，深以放达为非道”。并著论指出礼度的重要意义：“(圣人)设礼乐以开其大蒙，名法以束其形迹，贤者倚之以成其志，不肖企及以免其过”“背之则为失道之人，讥议以之起，向之则为名教之士，声誉以之彰”。^③而“放达似达，所以乱道”“外眩嚣华，内丧道实，以矜尚夺其真主，以尘垢翳其天正”。^④这都是针砭时弊，有感而发的。

可是，积重难返，无法挽回。谢安当政时，王羲之曾劝他：“今四郊多垒、宜思自效，而虚谈废务，浮文妨要，恐非当今所宜。”谢安却回答说：“秦任商鞅，二世而亡，岂清言致患邪？”^⑤不同的人生观决定了不同的处世态度。范宣“尤善三礼”“言谈未尝及老庄”。和戴逵同时拒绝征聘的龚玄之也是“学弘儒业”。《晋书》隐逸传中许多隐士都坚持儒学。在“贱经尚道，以玄虚宏放为夷达，以儒术清俭为鄙俗”的时代，这些儒者们要洁身自好自然最好不仕。一些坚持时髦玄学的当道者，对这种背时人也自然是轻视的。谢安就瞧不起戴逵。戴逵到建康，谢去看他，“谢本轻戴，见但与论琴书，戴既无吝色，而谈琴书愈妙”。^⑥戴逵对瞧

① 《晋书》卷九八桓温传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九一范宣传。

③ 戴逵《释疑论》，见《续古文苑》卷九。

④ 《晋书》卷九四戴逵传。

⑤ 《晋书》卷九八谢安传。

⑥ 《世说新语》雅量篇。

不起自己他抱无所谓态度。谢安虽佩服戴逵有雅量，但一直到死，都没举荐这位身怀美才、执节高抗、名重天下的隐士。

戴逵隐居，和性格趣好也有关系。《世说新语》雅量篇注引《晋安帝纪》说他“少有清操，恬和通任，性甚快畅，泰于娱生”。并且“尤乐游燕”。戴逵遗有一篇《闲游赞并序》，其中说：“山林之客，非徒逃人患、避争斗，谅所以翼顺资和，涤除机心，容养淳淑而自适者尔。”“故荫映岩流之际，偃息琴书之侧，寄心松竹，取乐鱼鸟，则澹泊之愿，于是毕矣。”他很明白地声称过隐遁生活，不单纯逃避现实，而是还要在大自然的怀抱和艺术的氛围中陶冶性情，这对于他的艺术发展至关重要。

但戴逵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他“多与高门风流者游”，与善行书性好音乐的谢安有一定交往；又为清谈家丹阳尹刘惔（字真长）所知；和王羲之的儿子，名士王徽之（字子敬）也有交谊。王徽之因此还留下一个雪夜访戴，造门不前，兴尽而返的佳话。不过，他对一般权贵却刚正不阿，不媚不屈。太宰司马晞是个“无学术而有武干”“不能率由王度，修己慎行，而繁纳轻剽、苞藏亡命”的藩王。^①戴逵居然对着他的使者砸琴，没有铮铮铁骨是不敢为的，这一点反映了他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可贵的骨气与情操。

戴逵一生以琴书自娱，不与时俗风流合污固然可贵，但在国家与民族多事之秋、多少志士为抗拒外侮，收复失地而浴血沙场，相比之下，他连其弟戴逵都不如。戴逵多次随谢玄抵御苻坚南侵，为国家利益作出贡献。《晋书》谢玄传记有这样一件事：“逵厉操东山，而逵以武勇显。谢安尝谓逵曰：‘卿兄弟志

① 《晋书》卷六四武陵威王晞传。

业何殊?’逵曰：‘下官不堪其忧，家兄不改其乐’。”弟弟为国担忧，哥哥却象没事似地泰于娱生，难怪谢安瞧不起他，这不能不看作是戴逵的一大缺点。

二、戴逵的艺术成就

戴逵是我国美术史上少有的多面手。《晋书》本传说他：“少博学，好谈论，善属文，能鼓琴，工书画，其余巧艺靡不毕综。”所谓“其余巧艺”包括雕塑。这些才能，在他童年时就综合显露过了。有一次他用鸡蛋清与小便揉合的瓦屑做了一个郑玄碑，^①又自己写文章，自己刻字，词丽器妙，时人莫不惊叹。

戴逵作为一个为世所重的隐士，确立他当时的社会名望首先不是靠艺术，而是道德文章。他一生共有多少著作已不可考。在他死后近两百年的隋代，尚有部分著作流传。《隋书》经籍志所记的图书目录中，有《戴逵集》九卷（已残缺）、《五经大义》三卷、《纂要》一卷（亦云颜延之撰）、《竹林七贤论》二卷（陶潜《群辅录》记竹林七贤，提到“戴逵为传”，应是另一种著作）。到了唐代，在新旧唐书的经籍艺文志中，就只有《戴逵集》与《竹林七贤论》两种了。以后又逐渐散佚。《晋书》本传录有他关于放达为非道的论文，恐非全貌，可能是集子里某篇的断片。清代孙星衍《续古文苑》也辑录两篇戴的遗文《释疑论》与《闲游赞并序》，两者已在上文摘引过，可以窥见戴逵的思想与文采。从这些极不完整的资料看，戴逵的著作还是相当丰富的，内容可能较多地涉及经史。

戴逵获得社会声誉的第二种美才是琴艺。在山林之客的日

^① 郑玄，字康成，汉末儒学大师。

常生活中，琴艺比别的事物更为重要和密切。戴逵“能鼓琴”。这“能”字不是现代汉语的“会”的意思，而是擅长。太宰闻名，谢安与论，都表明戴逵的琴艺有相当造诣和影响。弹琴看来是戴氏的传家技艺，戴逵、戴述都能弹，可惜没有其他更具体的记载。戴逵把自己演奏和创作的作品都传给两个儿子，他死后儿子们不忍重弹，各自另创新谱。《隋志》经籍志记有“琴谱四卷、戴氏撰”，很可能是戴逵以及其兄与子的作品。在《新唐书》艺文志所收的音乐书籍目录中已不见这四卷琴谱，想必那时已经亡佚。

今天我们要了解和研究的，是戴逵在美术方面的成就，因此其他方面的成就只能简述或略去。下面根据现有材料，分别叙述绘画与雕塑两方面的成就。

（一）绘 画

《续晋阳秋》说戴逵“善图画，穷妙丹青”。他是个早熟的作家，十几岁在瓦官寺作画就受到王濛的赏识。王濛自己是个画家，很早就看出戴逵的艺术才华与前景，并为自己看不到他的成功而遗憾。

青年时代的戴逵，到范宣处就学时，仍然坚持画画。范宣起初认为画画没有用处，劝他不宜为此耗费精力。戴逵于是根据后汉张衡的《南都赋》画了一幅画，范宣看了很感叹。大概他这才认识到绘画艺术的功能，不但觉得画画很有益处，据说自己也学起画来。^①

^① 见《世说新语》巧艺篇。